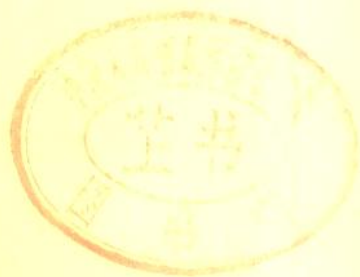


08386

论宋明理学

宋明理学讨论会论文集



中国哲学史学会 编
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所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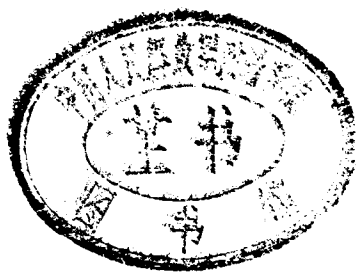


国防大学 2 072 7801 5

论宋明理学

宋明理学讨论会论文集

中国哲学史学会编
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所



浙江人民出版社

论 宋 明 理 学

宋明理学讨论会论文集

中国哲学史学会编
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所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25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7.625 插页2 字数406,000 印数0,001—7,600

1983年10月第1版 1983年10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2103·4

定 价：1.92 元

620686/09

前 言

宋明理学，作为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官方哲学，从北宋到明清之际七百年间，一直占据了统治地位。宋明理学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它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不但在国内有较深远影响，而且影响到国外。因此，宋明理学一向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研究对象。它是中国哲学发展链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宋明理学既有较多的唯心主义和封建糟粕，又在理论思维方面达到了较高水平。只有以科学态度把它置于当时历史条件下，进行实事求是的探讨，才能更好地说明中国哲学的发展史，才能正确总结哲学的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为了促进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分析解剖宋明理学，推动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发展，一九八一年十月十五日至二十一日，中国哲学史学会和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所杭州联合举办了全国宋明理学讨论会。这次讨论会是中国哲学史学会成立以来，继一九七九年十月在太原举行的第二次全国性学术讨论会。出席这次讨论会的专业和业余中国哲学史工作者达二百六十余人，其中包括美国、日本、西德、加拿大、瑞典和斯里兰卡的学者。

讨论会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着重讨论了：宋明理学的性质、特点、派别及其历史地位；程朱理学及其评价；陆王心学及其评价；理学及反理学的斗争；理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等。

讨论会收到论宋明理学和论中国哲学思想的论文一百八十五篇，专著三部。除许多论文陆续在报刊上发表外，我们又选编了两个专集，分别题名为《论宋明理学》和《论中国哲学史》。在浙江人民出版社大力支持下出版。

两部论文集对宋明理学各派和中国哲学史各个时期的哲学思想均有论述。《论宋明理学》专集中，论宋明理学的性质、派别、特点及其历史地位和论朱熹、王守仁的文章较多。《论中国哲学史》专集中，包括研究理学的方法论，古代、近代和少数民族哲学思想的文章及有关资料。这与此次讨论会的实际情况是一致的，也反映了中国哲学史界近年来科学研究和这次讨论会所取得的部分成果。

遵照“百家争鸣”的方针，我们在选编时，注意了选收观点不同的文章。两书所选文章及其排列次序，均由出版社最后决定。

两部论文集的编辑工作由衷尔巨主持，编辑是（以姓氏笔划为序）：王国轩、许抗生、严健羽、衷尔巨、焦树安、葛荣晋。编辑工作中的错误和不妥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目 录

前 言

- 试论理学的形成姚瀛艇 (1)
- 略论宋明理学张立文 (14)
- 略论道学的特点、名称和性质冯友兰 (37)
- 理的早期形态及其演变谷 方 (57)
- 由周敦颐“太极说”展开的哲学争论李德永 (76)
- 邵雍哲学思想初探李书增 (92)
- 关学思想流变陈俊民 (107)
- 试论张载的朴素唯物主义气本论冯憬远 (124)
- 张载认识论思想评议刘宏章 (148)
- 略论二程的理气观徐远和 (167)
- 略论程朱理学之援佛入儒朱日耀 (180)
- 朱熹的自然观与宇宙生成论赵吉惠 (198)
- 试论朱熹哲学的“太极”傅云龙 (212)
- 朱熹理学范畴吴乃恭 (226)
- 略论朱熹哲学的理蒙培元 (244)
- 朱熹教育思想试评陈增辉 (261)
- 朱熹的易学思想钟肇鹏 (281)
- 略论朱熹哲学思想的积极一面周德丰 (299)
- 试论程朱理学的特点、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
.....陈正夫 何植靖 (314)

论陆九渊心学唯心主义	王 茂 (328)
论陆九渊的宇宙观及其时代作用	李之鉴 (343)
陈献章的哲学思想	马振铎 (359)
王阳明哲学的内在矛盾	沈善洪 王凤贤 (377)
王阳明“知行合一”命题发微	臧 宏 (394)
论王守仁的“致良知”	顾宝田 (413)
源于道德生活的哲学	伍雄武 (424)
王阳明实践道德说初探	刘宗贤 (440)
王守仁的政治思想与教育思想	许抗生 (456)
略论张载和王守仁的泛神论	曾乐山 (474)
略论王艮	陈金生 (489)
颜元对宋明理学的批判	李书有 (510)
“命”与“分”	李锦全 (525)
浅论宋明道学对古代数学发展的作用和影响	周瀚光 (541)

试论理学的形成

姚瀛艇

本文所说的“理学”，专指二程（程颢、程颐）所创立的那个学派而言。二程哲学的最高范畴是“理”（或称“天理”）。这个“理”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永恒存在的宇宙万物的本体。对自然界来说，则“有理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数”（《河南程氏文集》卷九）；对人类社会来说，则“为君尽君道，为臣尽臣道，过此则无理”（《河南程氏遗书》卷五）。可见，这个理不仅是自然界的最高原则，而且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原则。这样一个学派，产生在北宋时期，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本文试图从经济基础、政治背景、思想渊源等方面，对理学产生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一 唐宋之际中国封建社会的重大变化 是理学所以产生的经济基础

在我国封建社会长期而缓慢的发展过程中，唐宋之际是一个重大的转折时期。这个转折，表现在地主阶级方面，是南北朝以来通过对部曲、佃客的直接人身控制进行剥削的士族门阀，最终退出历史舞台，代之而起的，是通过租佃制对客户进行剥削的“官户”和“乡户”地主；表现在农民阶级方面，是南北朝以来荫庇制下的部曲、佃客最终退出历史舞台，代之而

起的，是租佃制下的“客户”。由于这两个代替，遂使地主对农民的直接人身控制相对地削弱了；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相对地缓和了。这个变化，从唐中期开其端，到北宋时期已明显地表现出来。“客户”由“私属”变为封建国家的“编户”，封建国家把“客户”当作“齐民”看待，就是这一变化在法律上的反映。适应这一变化，地主阶级除了强化国家机器，从政治上加强对农民的治疗外，迫切需要建立一套能把自然观、认识论、伦理观、道德观等等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哲学体系，以便全面地对自然、社会、人生问题等等作出有利于地主阶级的解释，从思想上加深对农民的麻醉。汉儒章句训诂之学，当然不能适应这种需要；赤裸裸的天命论，虽然仍是地主阶级的有力武器，但也远远不能适应这种需要。于是，以“穷理尽性”为核心的“理学”，就应运而生了。

二 赵宋王朝厉行集权，重整伦常 是理学所以产生的政治背景

赵宋王朝是宋代地主阶级的总代表。这个王朝是在经历了唐末五代以来长期混乱局面之后建立起来的。五代时期，王朝急遽更替，五十三年之间，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国被弑者八，伦理纲常，特别是君臣一纲，遭到严重的破坏。为了争夺帝位，子弑其父者有之，臣弑其君者有之，发动兵变者有之，勾结外族争当儿皇帝者有之。除了这些乱臣贼子以外，一般文臣士大夫，“以仁义忠信为学，享人之禄、任人之国者，不顾其存亡，皆恬然以苟生为得，非徒不知愧，而反以其得为荣。”（《新五代史》卷三三《死事传》序）其典型的代表，就是冯道。他于唐明宗时开始任宰相，以后每当易代之际，他都扮

演率百官班迎、奉表劝进的角色。所以，尽管改朝换姓，他总不离将相公师的高位。晚年还写了一篇《长老乐自叙》，历数其所得阶勋官爵以为荣。冯道的一生，很能说明当时士大夫寡廉鲜耻、毫无君臣之义的情况。正因为士大夫毫无气节，所以欧阳修撰《新五代史》，要表扬全节之士，就只找到王彦章、裴约、刘仁贍三个人；前二人都出于军卒，后一个又是伪国之臣。对此，欧阳修无限感慨，连声说：“可胜叹哉！可胜叹哉！”赵宋王朝，就是在伦理纲常遭受这样严重破坏之后建立起来的。为了使己不成为第六个短命的王朝，它必须一方面厉行集权，加强朝廷的统治力量；一方面重整伦常，恢复并发展封建伦理秩序。

为了重整伦常，北宋朝廷不断旌表忠孝节义之士。如赵匡胤于建隆元年（公元960年）正月初四日甲辰即皇帝位，初八日戊申就下诏嘉奖为后周死难的天平节度使、同平章事、侍卫马步军副都挥使、在京巡检韩通，赠韩通中书令，葬之以礼，以嘉其临难不苟。《宋会要辑稿》有一个“旌表门”，连篇累牍，都是这一类诏令。但这仅仅是重整伦常的一个方面，而且不是主要的方面。主要的方面是北宋朝廷力图使伦理纲常理论化，使之深入人心。这里需要作一个简单的回顾。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孟子只是提出几条简单的伦理规范，如弟子入则孝，出则悌，不许犯上作乱等等，并没有作理论的说明。到了汉代，汉儒明确提出“三纲”，并赋予神学的说明，比之孔孟，就进了一步。到了宋代，这种神学化的儒学，虽然仍能为王朝服务，但毕竟过于粗糙，不能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政治经济情况。因此，摆在北宋王朝和宋代地主阶级面前的一个迫切的历史任务，就是进一步改造神学化的儒学，创造一种新儒学，使之更富于思辨的色彩和理论内容，为伦理纲常制造一个哲学根据。

为此，北宋王朝和地主阶级的思想家，都作了大量的工作。

北宋王朝用全力提倡儒佛道三家思想，力图以儒学为核心，建立一个新的思想体系。为了提倡儒学，一方面，北宋朝廷努力抬高孔子的地位，如建隆二年（公元961年），宋太祖下令贡举人到国子监拜谒孔子，并著为定例；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宋太宗下令恢复孔家被周世宗所剥夺的免役免税的特权；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宋真宗下令追封孔子为“元圣文宣王”；同年，宋真宗到泰山封禅，亲到曲阜孔庙行礼，拜谒孔墓等。另一方面，宋王朝努力宣扬儒家思想，如咸平二年（公元999年），真宗命国子监祭酒邢昺等核定《论语》、《仪礼》、《礼记》等书的正义，颁行学官，又自撰《文宣王赞》，歌颂孔子为“人伦之表”，儒学是“帝道之纲”；又撰《崇儒术论》，说“儒术污隆，其应实大；国家崇替，何莫由斯”，一再表明儒学是宋王朝统治的指导思想。为了提倡佛教，太祖开宝年间，开始在益州雕印大藏经，到太宗时完成，这是我国第一部印行的佛经总集。太宗时在汴京设译经院，翻译佛经；又在五台、峨嵋、天台等山修建佛寺。真宗更大力提倡佛教，在写《崇儒术论》的同时，又写《崇释论》，说佛教与孔孟“迹异而道同”；又继续建寺译经，并亲自为佛经作注。为了提倡道教，太宗曾召见华山道士陈抟，赐号“希夷先生”，又在汴京、苏州等地建立道观。真宗诏赐信州道士张正随为“虚静先生”，这就是后来江西张天师的开端。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真宗任命张君房为著作佐郎，专修道藏，到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编成《大宋天宫宝藏》七藏。张君房又根据七藏，提要钩凡，编成《云笈七签》一书，对道藏进行一次彻底的整理。在整理道藏的过程中，真宗又特别下诏剔除其中攻讦佛教之作。真宗并多次宣扬释道二门，有补世教；

三教之论，其旨一也，等等。凡此，均表明宋王朝力图把儒释道三家糅合在一起，建立一套新体系的意图。

但新体系的建立，毕竟要通过地主阶级的思想家才能完成，二程就是应运而生的思想家。通过他们的努力，终于初步建立了一套唯心主义的新体系，为伦理纲常制造了哲学根据。从此以后，伦理纲常再不是几条干巴巴的教条，也不再蒙上神学的迷雾，而是涂上了思辨的油彩，被赋予理论的说明。其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也就更为有效有力了。

三 韩愈所倡导的儒学复兴运动是理学的先驱

唐代韩愈所倡导的儒学复兴运动和儒佛道三家的长期融合，为理学的产生作了必要的思想准备。

孔孟本不善于抽象思辨和逻辑分析，他们所讲的，主要是修齐治平之道和礼乐刑政之术。两汉时期，儒术独尊。但两汉的儒生，或埋头于章句注疏，皓首而不能穷一经；或与神仙方士相结合，衍为迷信谶纬之学，在思想理论方面，毫无建树。魏晋以降，佛学大行，儒学日趋式微。这一时期，也有人批佛。如范缜提出《神灭论》，批判了佛教的神不灭论。但也只是在形神关系方面批判了佛教，尚未能提出比较完整的体系。直到韩愈，才把反佛斗争推到新阶段。

韩愈鲜明地打出复兴儒学的旗帜，力图恢复儒家在思想领域中的正统地位。他写了《原道》、《原性》两篇著名的文章。在《原道》一文中，第一，他划清儒、佛之“道”的界限，认为佛家之“道”是小人之道，佛家之“德”是凶德；儒家之“道”是君子之道，儒家之“德”是吉德。第二，明确建立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一脉相承的儒家道

统，以对抗佛教各宗派传法世系的宗教法统。第三，宣扬儒家《大学》的唯心主义体系，以对抗佛教的宗教唯心主义体系。第四，对佛、道两教，主张“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在《原性》一文中，他提出了“性三品说”，并以是否符合封建伦理规范作为划分三品的根据，用以对抗佛教出世的人性论。由此可见，韩愈对佛教的批判，无论在广度或深度上，都超过了前人。

作为儒学复兴运动的倡导者，韩愈尚不可能建立起严密的理论体系，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把佛学批倒。但是，他所提出的自尧舜以下的儒家道统说，为二程所继承；他所阐明的儒家之“道”，为二程所承认；他所提倡的“性三品说”，为二程提出气质之性、天理人欲之辨开辟了道路。因此，可以说韩愈复兴儒学运动是理学的先驱。

二程一方面接过韩愈反佛兴儒的旗帜，以继承孔孟的绝学自任；另一方面，又从佛学中吸取思想资料，甚至借用佛教的概念、术语，用以改造神学化的儒学，初步建立起一套把自然观、认识论、人性论、伦理观、道德观等等联系在一起的唯心主义体系，从而初步完成了韩愈所倡导的儒学复兴运动，并在适应赵宋王朝建立新体系的道路上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到了朱熹，又以小程为宗主，糅合佛老，兼采周张，构成了一个精致的唯心主义体系，最后完成了儒学复兴运动，也最终实现了赵宋王朝建立新体系的意图，完成了宋代地主阶级思想家的历史使命。

四 儒释道三家相互融合是理学的思想渊源

小程在《明道先生行状》中说大程“泛滥于诸家，出入于

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河南程氏文集》卷一一）。这段话说明理学是诸家（主要是儒释道三家）融合后的产物。

儒释道三家思想的融合，从魏晋南北朝时就已开始。那时的主要特点是儒佛并存、或儒佛道并存，而又各自独立，互不相混。如梁武帝萧衍，本来是一个儒生，撰有《中庸讲疏》，但又三次到佛寺舍身，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葛洪是著名的道教徒。他所著的《抱朴子》，内篇言神仙方药，鬼神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祸之事，完全是道教的一套；外篇言人间得失，世事臧否，却又是儒家气象。到唐宋时期，儒释道三家才逐步融为一体；融合之后，又都不是任何一家的本来面目。如北宋高僧契嵩，在他所著《镡津集》的《辅教篇》里反复强调：佛儒“心同迹异”，佛家的“五戒”就是儒家的“五常”，因而佛儒同样有益于治道。契嵩是援儒以入佛。他保持着“佛”这张面孔，但已不是本来的面目。北宋著名道士张伯端在《悟真篇》序中也反复强调教虽分三，道乃归一。从儒家营垒来看，周敦颐也说一部华严经，一个艮卦可了。上述情况都说明，到唐宋时期，三教归一，已成为历史的必然趋势。赵宋王朝力图糅合三教，正是顺应了这种趋势，而且促使这种趋势更向前发展。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大潮流中，二程才可能泛滥百家，出入释老，返求六经，而后创立自己的体系。

那么，二程究竟从释老那里吸取了什么东西？这还应从“天理”二字说起。在二程笔下，“天理”具有这样的特点。第一，“天理云者，这一个道理，更有甚穷已？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人得之者，故大行不加，穷居不损。这上头来，更怎生说得存亡加减？”（《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这是说“理”无穷已，非人力所能干预。第二，“天下物皆可以理照”（同

上，卷一八），“不独人尔，物皆然，都自这里出去。”（同上，卷二上）这是说“理”先于人和事物而存在。第三，“天下只有一个理”，“一物须有一理”（同上，卷一八），“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同上，卷二上），“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同上，卷二上）这是说每一物都由“一个理”产生，每一物都体现了那“一个理”。由此可知，这个“理”实即脱离现实世界、超越一切、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永恒存在的精神本体。它和佛家所说的“真如”（或称“佛性”，意为最后的真理）完全是一码事。禅宗大师大照已称“佛性”为“理”。所以二程所说的“理”，其实是套自禅宗的真如佛性。至于二程所说“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更是华严宗“理事说”的翻版。此点为大家所熟知，无须多说。

怎样体验掌握这个“天理”呢？小程有一段精采的论述。他说：

学者先务，固在心志。有谓欲屏去闻见知思，则是绝圣弃智。有欲屏去思虑，患其纷乱，则是须坐禅入定。如明鉴在此，万物毕照，是鉴之常，难为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万物，亦难为使之不思虑。若欲免此，唯是心有主。如何为主？敬而已矣。……所谓敬者，主一之谓敬也。所谓一者，无适之谓一。且欲涵泳主一之义，一则无二三矣。……但存此涵养，久之自然天理明。（《河南程氏遗书》卷一五）

为了使“心”不受外物的干扰，他们甚至把博学、作文、读史、读经都看作是玩物丧志。谢良佐博闻强志，自负该博。曾对大程举史书，通篇不遗一字。大程却当面批评他说：“赅却记得许多”，谢良佐不觉身汗面赤，无地自容。象这样书也不要读，文章也不要作，对外界事物不作任何研究，终日坐在屋

里，主一，无适，以求豁然贯通，天理自明的体认“天理”的方法，和禅宗所说不读经，不苦行，只是坐禅入定，以求顿悟成佛，又有什么区别？

为了使“心”不受外物的干扰，大程提出了“定性说”。他在《答横渠张子厚先生书》中说：

所谓定者，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苟以外物为外，牵己而从之，是以己性为有内外也。且以性为随物于外，则当其在外时，何者为在内？是有意于绝外诱，而不知性之无内外也。既以内外为二本，则又乌可遽语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事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易曰：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苟规规于外诱之除，将见灭于东而生于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顾其端无穷，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适道，大率患在于自私而用智。自私则不能以有为为应迹，用智则不能以明觉为自然。今以恶外物之心，而求照无物之地，是反鉴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孟氏亦曰：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与其非外而是内，不若内外之两忘也。两忘则澄然无事矣。无事则定，定则明，明则尚何应物之为累哉？（《河南程氏文集》卷二）

在这篇名著里，大程反复强调无心，无情，内外两忘，物来顺应，反对用智，反对规规于外诱之除，不是和老子的思想完全一致吗？

关于人性论，二程除了受韩愈“性三品说”的影响外，还受道教思想的影响。如小程说：“性无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性即是理，理则自尧舜至于涂人，一也。才禀于气，气有

清浊。禀其清者为贤，禀其浊者为愚。”（《河南程氏遗书》卷一八）类似的话，唐末著名的道士杜光庭早就说过：“得清明冲朗之气，为圣为贤。得浊滞烦昧之气，为愚为贱。”（《道藏·洞神部·玉诀类·道德真经广圣义·不尚贤》第二注）小程的话与杜光庭的话，几乎完全一样，当然只能是小程受杜光庭的影响。

以上所说，已涉及二程的自然观、认识论、人性论各个方面，而其中无不可以看出佛、道的烙印。由此可知，二程是吸取佛、道，融合三家，才体贴出了那个“天理”，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用这个体系，来解释人类社会，其必然的结论，只能是“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河南程氏遗书》卷五）。于是，伦理纲常就成为神圣不可改变的“恢恢天理”。二程就这样初步完成了宋代地主阶级思想家的历史任务。所以，儒释道三家思想的融合，是理学的思想渊源；理学是一种被改造了的新儒学，或者是佛道化了的新儒学。

五 中唐以后疑古惑经风气的盛行， 为理学的产生创造了有利的环境

上面分析了理学的思想渊源，如果没有这些渊源，理学显然是不能形成的。但是，如果不突破汉儒章句注疏之学和笃守师说的家法的束缚，这种被改造了的新儒学，也仍然是不能产生的。而中唐以来疑古惑经风气的盛行，正好突破了这种束缚，为理学的产生，创造了有利的环境。

汉儒治经，无论今文、古文，都是笃守师说，不敢逾雷池一步。末流所及，竟然出现了“宁道孔孟误，讳言服郑非”的